

洗馬花燈會

天地与我，共享自然！

CANGTU CULTURE CHINA

XINGJINGCHENGSHIJIYUAN

BAZHUXING YUNAYI

浠水县洗马镇龙灯协会
浠水县文化馆编
浠水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

湖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湖北省民间文化艺术之乡命名

洗馬花燈會



浠水县洗马镇龙灯协会
浠水县文化馆编
浠水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

二〇一四年八月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洗马花灯会 / -- 中国楹联出版社, 2014

ISBN 978-988-16163-5-6

I. 洗… II. 浞非… III. 洗马花灯会

中国楹联出版社版本图书

书名: 洗马花灯会

编著: 浞水县洗马镇龙灯协会 / 浞水县文化馆
浞水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

出版: 中国楹联出版社

规格: 889×1194毫米 1/32

印张: 9.25 字数: 25.5千字

印数: 0001-1000册

版次: 2014年8月第1版

2014年8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988-16163-5-6

《湖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湖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The Provincial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ventory of Hubei Province)

洗马花灯会

编委会

总顾问：闫吉 高楚平

顾问：闫桂华 郭国胜

主任：邓爱萍

副主任：郭锡根 胡兴华 徐丹 周慧玲

张瑞中 蔡佑明 王景华 冯小华

王小毛 蔡莹卓 周金红 陈希武

委员：(按姓氏笔画)

王为国 叶崇德 叶艳山 叶双喜

李百君 李寿生 何云飞 何德光

何国民 何建国 周金光 周长江

周本良 周友志 周镰 周强

姜文珍 胡国营 胡为中 胡汉熙

胡高兵 涂文勇 涂卫春 涂佳强

涂顺宗 曹松林 谢光新 裴桂林

蔡建兵

洗马花灯会

编辑部

主 编：徐 良 周金红
副 主 编：张本国 周 白 徐冰川
执行主编：汪 洋 徐水秋
编 辑：王晓霞 汪伊萍 周 鹏
周小春 姜文珍 周 猷
成 员：朱向红 胡泽光 周圣丰
叶 晗 蔡 诚 周常青
摄 影：徐水秋 苏小燕 周小春
版面设计：徐水秋 申 玲
校 对：汪 洋 王晓霞 周 猷
打 字：汪伊萍 周 鹏 周 猷

卷首语

湖北，旧时被中原诸夏视为蛮荒之野，明明是草木葱茏，却偏偏以“荆楚”名之。楚者，至少还有各色林木，若冠以“荆”，就等而下之了。灌木如何能与乔木比肩？

君不见，早在文字尚未诞生之前，这块“蛮荒之地”上就有了人类活动的足迹……

先从年代较早的旧石器时代说起：

早在100万年前，郧县就有古人类在活动。50万年前，古人在郧西白县龙洞、郧县梅铺都留下了活动的痕迹，这一批古人大致与北京人处在同一时代。与北京人比，郧县青曲镇弥陀寺曲远河口汉江北岸发现的两个“郧县人”头骨更具原始性（这两个头骨都属于中年男性，专家命名为郧县人，归属于直立人郧县亚种）。20万年前，长阳人出现；10万年前，郧西人出现；2万年前，汉阳人出现。

虽然荆楚大地上有如此众多的古人类遗物，但遗憾的是，我们并不能就此判定他们就是我们荆楚民众的直系祖先。无论考古史料如何完整，中间总会有缺环。人是有腿的动物，哪怕一天无意识地走上十余公里，仅以千年计，也不知会离开某地几百万公里。若以万年为单位，其结果足以吓出我们的懵懂和无知。

旧石器时代，人们以采摘和狩猎为生，居无定所。

稍后一点，原始农业出现，人们开始“刀耕火种”。一块土地耕种若干年后是会被弃荒的。人类生活处在缓慢的流迁之中。

新石器时代，荆楚大地上的文化遗存更为丰富，且饶具地方特色：

湖北最早的新石器文化遗址是城背溪文化，然后是大溪文化，代表性遗址有湖北宜都红花套等近20个。紧接其后的是屈家岭文化，这一时期出现了防御性的古城池。石家河文化分布范围基本上与屈家岭文化重合，但出现了众多类型，有石家河、青龙泉三期、季石、西花园、尧家林等类型。

值得注意的是，即便是在原始农业相对发达的新石器时代，人们有了城池，也会因为部落之间的战争、自然灾害，包括瘟疫等原因而迁徙。

20世纪80年代以来，湖北发现了一批史前古城址。如石首市走马岭古城、江陵阴湘城、荆门马家垸古城、天门石家河古城、应城门板湾古城，这些城址皆为新石器时代晚期。这些城址的出现，足以证明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同步甚至更早一点迈入了文明的门槛。

春秋战国时期，楚地城池更是多如繁星。

可见，“蛮荒之地”并不蛮荒，而被人视为“蛮荒”，这是中原为君长者自得于天下、以中原为政治中心的俯瞰角度所致。

之所以不厌其详地列举荆楚大地上的古文化遗址，是因为人类是一种社会性动物。人类的社会性活动，为人类文化的产生提供了先决条件。荆楚大地上的古文化遗址，为我们今天研究古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提供了诸多信息，当然，也包括一些尚未解开的谜团。

遗憾的是，如此众多的文化遗迹所包含的众多古代“民俗”信息，却一直未被我们民间文化工作者所重视。这也许是当初考古学、民俗学“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

来”、长期隔绝的必然结果。

从文化的发生过程来看，显然，是民间文化的曙光率先照亮了人类文化智慧的大门。即便到了贵族（公室）文化成为主流文化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民间文化仍然是社会的基底文化，影响、决定着“国家”文化的基本“色调”。无论是在漫长的封建社会还是在日新月异、飞跃进步的新时代，民间文化依然是民族文化的先声、基调和母体。不要忘记，人文伊始，她也曾经是社会文化的“主体”。

正因为如此，千百年来，民间神话传说——无论是韵文体的歌谣，还是散文体的故事，都被历朝历代的老百姓当作口传的信史。

也正因为如此，我们在20世纪90年代初，在进行楚地习俗的研究过程中，就提出了中华民族文化传承的“两个载体”说，明确宣称：民间文化是中华文化的软载体。（参见《楚俗研究》第一集“序言”。湖北美术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这与本世纪初，国家提出的民族民间文化遗产（后改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理论基础不谋而合。

在此基础上，我们进一步提出了历史文化研究领域里的“三维论证——多维操作”法，并为相当一部分学者所接受。所谓“三维论证”，指的是用文献典籍、文物、民俗事象等相互印证；“多维”是在前述“三维论证”时加上“时间轴、空间轴”。加“时间轴”是为了显现文化事象的纵向继承与流变；加“空间轴”是为了显现文化事象的传播和异同。（参见《楚俗研究》第二集三集相关文章）

经过近20年的努力，湖北考古、历史、民间文化的学者们相互支持、协作，开辟了学术研究的“生荒”，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1995年，湘鄂渝川四省市的学者汇聚宜昌，就“巴楚

文化”的命题进行讨论，认定巴楚文化的特质为“非巴非楚、亦巴亦楚”，为楚文化与巴文化冲撞、交融后产生的亚区域文化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并于1997年5月由中国三峡出版社出版了《巴楚文化研究》论文集。

尔后出版的《巴楚文化源流》专著，集数十名学者之力，采用以史为经、以民俗为纬的“上”形结构——上编“古代巴楚文化”从先秦至改土归流，介述巴楚文化的形成与流变；下编则横向介绍“近百年间的巴楚”民俗文化，更将巴楚文化研究引向深入。

2005年，鄂赣浙等省学者会商于鄂州，议定以“楚地吴文化、吴地楚文化、吴楚交错地带的文化”为对象，进行吴楚文化特质的研究。

近20年来，湖北民间文化界大量吸收考古、历史学界的新成果，使得湖北民间文化的研究得以快速发展，并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虽然民俗学的成果能用来帮助诠释一些历史文化现象，使得历史文化现象的细节更加丰满、鲜活，甚至能够帮助“发现”某些公认的已经灭绝的文化现象在某个文化“孤岛”上的“孑遗”，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民间文化工作者对其他学科，如历史学、考古学的依靠可以减少分毫；相反，应更加依靠历史学、考古学的新成果，准确判定民俗文化事象的起源时间和流变坐标。我们很乐意看到在文化研究过程中，历史学、考古学、民俗学的相互支撑，但要力避以己之短、克人所长的现象。

湖北是一个文化大省，准确地说，是一个文化资源大省。历史文化遗址的丰富性，业已在前文中有所介绍。历代文物的大批量出土，业已证明了湖北历史文物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在民间文化方面，湖北文化大省的特征表现得非常突出。

十多年前，我们提出，汉民族民间文化具有地域的差异性。现在看来，这个观点已经太保守、陈旧，远远落后于我们的文化存在和研究实践。仅以湖北为例，民间文化就存在着若干个区域色块。

我们先对湖北民间文化区域色块进行横向的排列介绍：

从湖北最东面的黄梅、武穴，经过阳新、大冶、黄石、鄂州、黄州，一直到武汉（抑或超过武汉），是为吴楚文化区域。吴、楚文化从相距甚远到反复进退，直至楚文化覆盖吴越地区，因相互交流甚久，诸多民俗文化现象，甚难区分定性，但也并非全无踪迹可寻。此区域中，从文化形态来看，所谓吴、越，只是名称不同，基底都是越文化。所谓吴楚文化，本质上应称之为“越楚文化”。在这一区域里，除了吴、楚文化成分外，还有中原文化及后来“出峒”的“巴蛮文化”成分。

从武汉经荆州到宜昌为荆楚文化区域，是楚文化的中心腹地，保留着较多的楚风楚俗。

从宜昌经恩施到重庆，包括黔东北，是为巴楚文化区域。该文化的中心区域在三峡地区和清江流域。巴楚文化区域里的民俗文化表现为在吸收对方文化的同时，保留自己的部分特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从纵向来看：

孝感、随州、襄樊为蛮夏文化区。由历代南下的中原文化与本地原有的南蛮文化混融而成。在信仰崇拜中保留着部分南蛮特色，但民间礼仪制度已基本中原化了。

楚秦文化交流区，主要指十堰地区。其地在历史上先入楚地，后列秦国版图。有人以“秦巴楚”目之。其实，其中的“巴”，常指其地所处的大巴山，而非古代的巴国、巴文化。

鄂南咸宁地区民间文化构成较为复杂。从表层看，似为越文化与楚文化的复合。最新证据表明，此地古为三苗故地，至少是三苗向西南迁移的途经之地。崇阳商代铜鼓的出土或许能证明这一点。不可否认，魏晋时期，“出峒”巴蛮的一支流寓于此。

熟悉了以上内容，再来面对湖北纷繁多彩的民间文化现象，就一点也不会感觉到奇怪和迷惑不解了。诸多民间文化的谜团，就再也不是难题了。

潜江的草把龙、郧县的凤凰灯、来凤的地龙灯、恩施的五句子、五峰的板凳龙、长阳的穿号子、通山的戏凤凰和神歌、孝感的“百子彩”、大冶的土主会、黄石西塞山的神舟、鄂州的旱龙舟、黄梅的禅宗祖师传说、武穴的岳家拳……不胜枚举的民间文艺品种，无不具有历史文化的印痕，都是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地域历史文化相互作用的结果。

潜江草把龙——典型的南方稻作文化遗痕

郧县凤凰灯——秦人与楚人皆崇凤

来凤地龙灯——龙不离地为土家独有，翔凤显然来自楚文化。相关传说中的反秦意识，则为巴人、楚人所共有。

鄂西五句子——全国各地都有五句子，但以湖北恩施、长阳最具特色。

恩施的五句子不但数量巨大，而且句式的奇、偶之变十分有趣。文本读来是五句，演唱起来，却又将第三四句的后三字用剪裁重复的方式，构成第五句。原来的第五句因此变成了第六句。最后一句的“歌眼”铸就其艺术特色。

长阳的穿号子以五句子为结构核心，穿插以其他体式的民歌。两首内容风马牛不相及的民歌交织在一起，产生了意想不到的艺术效果，格外引人入胜。其穿插方式达数十种。

咸宁神歌——其庄重肃穆只有在崇巫尚灵的楚、越文化交会之地才有。楚乎？越乎？反正与中原南下的儒学距离最远。

孝感“百子彩”——于庄重繁缛的婚礼仪式中，嵌入民间“多子多福”的意识。

黄石西塞山神舟——既似本地古越人习俗的孑遗，又似吴越文化西进的结果。

大冶土主会——显然是明清“江西填湖广”移民文化的产物。

鄂州旱龙舟——祭龙是古越人习俗。旱龙舟中的主神位置却偏偏被楚人屈原占据。

湖北有着悠久的戏剧历史。如果从“优孟衣冠”算起的话，至今已有2000余年了。不仅如此，湖北的戏剧品种也十分繁多。汉剧、楚剧、黄梅戏、文曲戏、采茶戏、提琴戏、花鼓戏等等，不一而足。戏剧的发展，与地方民歌，特别是长歌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综观中国戏剧发展史，似乎可以从抒情短歌、叙事长歌、唱本（说唱艺术）到民间小戏，画一道连接线，以表示它们的脉络关系。而在事实上，民间说唱艺术、戏剧（包括皮影戏）对民间叙事长歌的发展也有着莫大的影响。许多题材，抒情、叙事短歌里提到，长歌、唱本、戏剧、话本里面都可以共用。谁借鉴了谁，恐非三言两语就能说清楚，更不能一概而论。

与繁多的戏剧品种、剧目相对应的是，湖北的民间叙事长歌、唱本也十分丰富，据不完全统计，全省民间收藏、流传的民间叙事长歌、唱本篇目，至少以三位数计算。限于当初的学识和财力，至今才开始关注此方面的内容。

类似的例子在湖北不在少数。

20世纪80年代进行的民间文学“三套集成”编纂工作，对各地民间故事、歌谣、谚语的基本情况，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拉网式”普查。但因为篇幅和认识水平的限制，遗珠之憾也不是少数。

进入21世纪以来，湖北各地，对于本土特色文化的研究逐渐走向兴旺。武穴市的吴楚民间文化、鄂州市的吴都文化、咸宁的民间叙事山歌、咸宁咸安区的嫦娥文化、孝感市的孝文化、荆州的关公文化、宜都市的民间谜语整理和研究、襄樊的诸葛亮文化及三国文化、宜昌和恩施的土家文化研究等，都进行得热火朝天，成果迭出。

新时代、新认识、新方法，解除当年的遗珠之憾，展示湖北民间文化研究的新成果，种种愿望都催促着我们，确有必要以新的出版形式来承载和展现湖北民间文化的新成果。这就是《荆楚民间文化大系》编纂、出版启动的原因。

游走在民间文学与作家之间的一批新故事创作者，是一个十分勤奋的群体。他们采撷民间文化的养料，酿造俗文学的花蜜，供应着社会文化的大餐，也是一群功劳有目共睹的文化工作者。其成果当然也在本大系的视野之中。

虽然难免有十指参差之别，但我们力求扬长避短，把“短”的做得更壮实一些，尽可能凸显民间文化的历史、地域特色，为子孙后代多留一些祖宗遗留给我们的文化遗产。

我们期待着读者的关注、批评和参谋。

编者

2009年9月20日

元宵盛会看洗马

鄢维新

元宵本是一个全民欢乐的节日。当今的元宵却越来越趋向冷清，元宵节的传统味儿越来越淡了。究其原因，除了家家门前挂花灯的盛况不再，踩街花灯的内容也逐年衰减——龙灯、狮子、彩莲船基本还在，其它的玩意儿逐渐地玩不见了。

话说到此，诸位看官也不必沮丧。至少在目前，还有一个去处，可以让有心人重睹传统元宵灯会人山人海、灯山灯海、火树银花不夜天的盛况。此去处便是湖北省黄冈市浠水县洗马镇。

先说洗马灯会上的花灯。宫灯、鳌鱼灯、鲤鱼灯、八卦灯、走马灯、孔明灯、霸王灯、太子灯、公主灯、金骨伞灯、万民伞灯、八姐游春灯……令人目不暇接。大的走

马灯直径竟超过大圆桌，内外三层，人物活灵活现。孔明灯既有圆的，也有方的。

让人大开眼界的是，在湖北并非普遍存在的“台阁”，竟也出现在洗马的灯会上。

传统的戏曲故事，如八仙过海、大闹天宫、梁祝姻缘、天仙配、断桥会也是洗马花灯经常表现的内容。

洗马灯会尤具民俗学、人类文化学研究价值的是与花灯相伴随的一系列民间传说。

“秦始皇赶山，龙女为救水族而自荐枕席，偷走赶山鞭，生下了‘龙生虎养凤遮阴’的楚霸王项羽……”。这一盛传于楚地的传说，到了洗马“落地生根”：三角山是秦始皇赶山填海时赶来的，东海龙女被置换成了鄱阳湖龙女。整个传说的背景移植到了鄱阳湖、庐山、三角山一带。

与其他地方不同的是，在洗马，有一种龙，除了香火、鞭炮之外，任何礼物、“利市”分毫不取，但照样履行它行云布雨、护佑一方的职责。此龙人称“老龙”，具有无上权威，是洗马与蕲春交界处的群龙之首。不同色彩的龙灯，常为排序等问题起纠纷，老龙一到，众龙无不言听计从。

老龙的所作所为，廉政意味颇浓。

洗马人认为他们的龙是有灵性的。数百年前的元宵，二位洗马篾匠打工到江西。当地百姓玩龙灯，官兵诬其谋反，一把火点燃了龙灯。或许是天意，火灭以后，包括龙

舌、龙下巴、龙头和龙尾竟然毫发无损。二位篾匠把它带回洗马，成为洗马灯会的“火种”。

洗马灯会中的许多花灯都伴有生动有趣的传说故事，如“霸王灯、太子灯、公主灯、金骨伞灯、八姐游春灯”等。其数量之多，令人咋舌。是先有灯，还是先有传说？从大部分传说故事和花灯的对应关系看来，似乎可以说，特定的花灯是某一传说故事的物化表现更容易让人接受。这是洗马灯会文化显著有别于其他地方的特点。

南方剪纸，特别是雕花剪纸，是因民间刺绣艺术的繁荣而兴盛的艺术门类。洗马的艺人们，将剪纸艺术应用于花灯，取得了锦上添花的效果。这也算是洗马灯会文化的又一特色吧。

洗马灯会，是民间的自发行为。但她绝非是一盘散沙似的无组织行为，相反，具有严密的组织机构和运作规矩。这与当地的宗族文化具有息息相关的联系。何、叶等姓氏宗族在洗马灯会形成过程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这对于研究宗族力量在民间历史文化传播中的作用，具有活标本的价值。

我们今天所见到的洗马灯会，在当地《叶氏宗谱》中便有记载。

仁者乐山，智者乐水。乐水者多巧智。灯会艺术的繁荣，必然有一批能工巧匠作支撑。洗马灯会在后工业文明的冲击下，能够依然显现异彩，与当地一批艺人的“坚



守”不无关系。何金寿、姜百盈、叶松炳、周济安、叶崇德、黄国庆等，都是洗马灯会的幕后英雄，都是值得为他们树碑立传的人物。

行笔至此，颇觉有些不耐。恨不得日月如梭，转瞬即是来年元宵，吾也好“元宵盛会看洗马”，一睹洗马灯会的全貌，一饱眼福。

（作者为湖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常务副主席，湖北省民俗学会副会长，湖北省吴楚文化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区域文化学者）

省

非

遗

保

护

名

录

· 洗马花灯会